



對中國文化 の鄉愁

日本著名學者看中國

青木正兒 吉川幸次郎 等 ◎著
戴燕 賀聖遂 ◎編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譯者前言

一一

青木正兒

夜裡香

二八

茴香

三八

用匙吃飯考

四四

白樂天的早酒詩

五二

中華文人的生活

五九

石田幹之助

長安盛夏小景

九二

當爐的胡姬……………九七

驪山溫泉……………一〇七

宮崎市定

科學和關節……………一一四

柳……………一一七

家常飯好吃……………一二三

中國的近現代繪畫……………一二五

倉石武四郎

燕京大學的落成儀式……………一二八

錢玄同和黎錦熙……………一三一

吉川幸次郎

中國文學與杜甫

~~~~~ 一五〇

對中國文化的鄉愁

~~~~~ 一六一

無神的文明和有神的文明

~~~~~ 一六七

帕斯卡的蘆葦

~~~~~ 一八三

艾茲拉·龐德

~~~~~ 一八五

文明的三極

~~~~~ 一九三

來薰閣琴書店——琉璃廠雜記

~~~~~ 一九九

杜跡行

~~~~~ 二〇三

湯川秀樹

莊子

~~~~~ 二一六

薊與馬

~~~~~ 二二一

知魚樂

~~~~~ 二二六

# 小川環樹

蘇東坡

二三〇

中國的春與秋

二四六

中國的點心與茶

二五一

留學的追憶——魯迅的印象及其他

二五九

湯川秀樹的隨想

二八九

繁體版後記

二九九

## 譯者前言

### 一

一九三七年冬，也就是盧溝橋事件發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見到了周作人。

那時的周作人，已經發表了不少關於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國，算得上為數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對日本這樣一個在他看來是「明淨直」的民族，它的對待中國，為甚麼只有「黑暗污穢歪曲」，只有離奇的「惡意」，比照歷年來的考察，周作人覺得還是謎一樣的不可理解。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說：那是因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裡的中國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平安時代、江戸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在日本歷史上，比如鎌倉時期，就是「武」的代表。

見到周作人時，吉川幸次郎才是京都大學一名年輕的中國文學講師，九年前他



到中國留學，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從一九一一年結束長達六年的留日生活歸國之後，周作人雖然也在北京大學開過日本文學的課，可他涉獵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日本。一九三七年，正是中日關係緊張到戰事一觸即發的時刻，迫於時局，周作人無奈地放棄了他的「日本管窺」，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卻跟不少日本的漢學家一樣，愈來愈感覺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緊迫性。一退一進之間，這兩人的截然不同的取向，也彷彿象徵著近代以來的中國和日本相互觀望時的姿態。

近代以後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僅在地緣政治上，與中國漸行漸遠，用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二）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話來說，中國和朝鮮，都成了日本在亞洲的「惡友」。在西洋文明的衝擊和感染之下，尤其經過甲午之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逼迫清政府割讓台灣並從清朝和俄國手中接掌了對朝鮮的權力，勢力直達中國東北，中華老大帝國的形象轟然坍塌，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大的新興帝國，正所謂攻守之勢易轉，普通日本人對於中國的看法驟然改變，對上千年來浸淫其中的中國文化，也產生了厭惡、鄙夷的心情。

漢學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遠的，不必說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戶（一六〇三—一八六八）時代，情況也還那麼不同。儘管德川政府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令一般漢學家都無緣接觸到現實中的中國，可是藉由文獻典籍抑或中、朝使者，

人們仍有機會認識中國，研習中國傳統的文化。某種意義上講，漢學既是關於中國的學問，也是日本的學問。比如朱子學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為官方之學，曾經佔有政治意識形態的主流，又比如賴山陽（一七八一—一八三二）那樣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寫一手典雅的漢詩，像他的這一首《岳飛》：「唾手燕雲志已空，兩河百郡虜塵重。西湖贏得墳三尺，留與遊人認宋封。」就幾乎沒有留下所謂「和臭」。然而，十九世紀後期的開國，卻讓日本在從此懷上綿綿不絕的「脫亞入歐」夢想的同時，漸漸淡卻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正像曾以「雜種文化」來形況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說，當西洋的一切都成為理想，日本也就「一邊倒」地從中國掉頭徹底轉向了西洋。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漢學，於是無可避免地遭遇了越來越被邊緣化的命運，漢學家們則發覺自己忽然變成了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裡的無聲無息的退隱之士，變成了「無用的長物」。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的形勢，就好像近代中國打開國門後的「西潮」澎湃的情形，浪濤滾滾，把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捲入到一個新的現代世界。吉川幸次郎雖然比周作人小了大約有二十歲，但他身處日本全面追求現代西方文明的大的轉折時期，跟周作人那一代受過「新文化」洗禮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和心情其實有一些相似，也就是說，潮流當前，他們在文化立場上，往往首先選擇的，都是與自己的傳統文



化及修養相去甚遠，代表了現代與先進的西方。他們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的觀念、趣味和潮流，就連在專業領域，也竭盡全力去同西方接軌。

大多數日本的漢學家似乎都已經看得非常明白，在這個時代，唯有同西方接軌，才是「預流」，才能保全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且提升漢學研究的價值，也才能在日本近代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當中，繼續取得發言的資格。曾是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他「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的自傳《西潮》中這樣寫道：「我們吃過炮彈的苦頭，因而也就對炮彈發生興趣。一旦我們學會製造炮彈，報仇雪恥的機會就來了。」這一段道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聲的自白，也恰好反映了日本近代漢學家的心路歷程。

同西方接軌，就日本的近代漢學而言，可以舉兩個比較為人熟知的例子。

我們知道，明治初期，一些富有漢學修養的家庭或私塾在教授子弟時，仍以研讀中國原典為主，四書五經而外，又有《史記》、唐宋八大家等等，比如講中國歷史，就常用到曾先之編寫的《十八史略》。可是到了明治二十年代（主要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左右，有「東洋史」創始人之稱的那珂通世等人倡議歷史教學的改革，主張棄用《十八史略》之類的漢文文獻，而使用那珂通世自己編寫的《支那通史》。而在此之後，中國史的講授思路和研究方法便大為改觀。據說《支那通史》編到宋

代以後，那珂通世就表示，向來被我們當作歷史綫索和基本史料用的《元史》等虛構太多，不足為據，現在需要把西方學者關於西域的研究補充進來，因為西域既包括在蒙古民族廣泛的活動區域之內，也是東、西兩個世界的重要聯結點。引入西方的文獻及其研究，正是中國史發展至東洋史的一個重要契機，稍後，桑原鵲藏編寫《中等東洋史》，在中國這一部分，把殷周（上古）稱作「漢族膨脹時代」、秦漢六朝唐（中古）稱作「漢族優勢時代」，把五代宋元明（近古）稱作「蒙古最盛時代」、清代（近世）稱作「歐人東漸時代」，也是從中古時代起，就將歷史敘述的重心移到了漢族與塞外各民族的衝突上面。

在東洋史的這樣一個架構之下，當蒙古、突厥、女真等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也被整編進來的時候，傳統中國史所關注的發生在中國內地的興衰流變，便再難以成為歷史敘述的脈絡和焦點。像桑原鵲藏的《中等東洋史》裡，還包括有印度、中亞，就是說這個東洋史，覆蓋了幾乎整個亞洲，而這樣一來，中國史，無論如何也只能佔到其中的一個部分。換句話說，一旦「東洋」這個區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國家成為歷史敘述的單位，「中國」無疑會從這種歷史的敘述中慢慢淡出。

發生在甲午戰爭前後的這樣一種學術方向的轉移，當然有它十分現實的背景。對於國力迅速增強的日本來講，重建亞洲新秩序以對抗西方列強，包括走所謂「日

支提攜」的路綫，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這種形勢之下，對中國的現狀及其歷史，都需要在更廣闊的亞洲視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一九一〇年前後，東京大學確定由國史、西洋史和東洋史構成史學學科，這一歷史學科目的劃分，就清楚地反映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觀以及它的自我定位，同時也標誌著從中國史到東洋史的學科轉型終至完成。

如果說上述的轉變，主要發生在歷史學領域，那麼，明治時代研究中國思想和文學的人喜歡討論「中國人是怎樣的」、「中國文明的傳統如何」一類的問題，究其實，也是要對中國的現狀及歷史做一番新的解讀和評價，而之所以對此產生興趣，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有必要將這些問題，納入到一個以西方的價值觀念為主體的解釋系統中去。比如在日本出版的首部《日本文學史》裡，我們就常常看到，作者是以比較的口吻，談及日本文學優美、中國文學雄壯，而西洋文學精緻等等結論的。在漢學家早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書，如藤田豐八的《先秦文學》裡，對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其創作文學所做性質的判斷，如說：漢民族有排他性而使種族純粹，卻也阻止了別國文學的侵入；崇古而使其文學多擬古，卻也妨礙了俗文學的發展；重抒情而使其敘事文學貧弱，重實用而使其虛構文學不能發達；中原的土地遼闊卻引致其文學的誇張，也缺乏精緻的思想和研究的態度，因而失去進步的機會等等，

所依循的，也基本上是來自西方的一種現代化敘事模式。

傳統的看法還都以為中國文學的正統當然是詩文，即使是在日本，漢詩文與和歌也一直被視為文學的主流。可是近代以來的日本知識分子跑到歐洲去一看，大都市的劇場既是上流社會的集會場所，也是國家儀式舉行的場地，戲劇在西方的社會生活中原來有著那麼重要的地位，回過頭來，於是就想到要在東洋「發現」劇場和戲劇。中國文學史脈絡中的戲曲，因此也就是在明治時代，由幸田露伴、笹川臨風這樣一批既兼通中國與日本文學，又善於融合西方理論的學者最早發掘出來的。戲曲的發現，不但瓦解了很久以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一種認知，更是顛覆了傳統裡比如「雅俗」等重要的文化觀念。

具有顛覆性的成果，還包括了像白鳥庫吉的《中國古傳說之研究》。在質疑堯舜禹的歷史存在、挑戰傳統漢學家的中國上古史觀的同時，依靠西方的科學史學的方法，白鳥庫吉也將對中國傳統史料的不信任推到了極點。又如桑原鵬藏的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吃人風俗、宮崎市定的論說中國歷來的奢侈風氣，也都是在一種相當宏大的現實關懷之下，於傳統的歷史敘述及歷史文獻之外，另闢蹊徑，重新構造出一幅別樣的中國風景。

在這樣一個風氣裡面，近代以來的日本漢學界特別流行一種看法，那就是與其

到中國留學，不如去德國、法國和英國取經。早在明治後期，為改革日本漢學的教學和研究，寫有《北京籠城日記》並做過京師大學堂教習的東京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就曾受命赴德國進修。到了幾十年後，石田幹之助在國內出版《歐人的支那研究》一書，詳述歐洲古代以來的漢學的形成和發展，依然大受歡迎。很多人還都明白，要想涉足敦煌學或是其他關乎西域的學問，要想研究中西交通史，就得掌握西域的語言並熟悉西方的典籍文獻，這樣的話，就一定要去西方學習。

向西方學習的，不只有語言，也不只是他們在處理文獻資料上的科學手段，還包括有田野調查的方法，也就是到中國來做實地考察。近代西方興起的社會學、人類學風氣給日本漢學家帶來相當的刺激，感慨於源自傳教士傳統的西方學者不滿足於了解文獻中國而深入內地調查實際中國的精神，他們把足蹈中國內地、耳聞中國語言、閱讀中國新作的方法，稱作用「活的眼睛」看中國。由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支持、白鳥庫吉負責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便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在當時，它不僅頻繁組織在中國的大規模調查活動，也的確收集到龐大的資料報告。而直到二戰結束以前，由於往來出入幾無限制，一般從事漢學研究的人，大都有機會遊歷中國。

發生在東洋史學、中國文學史學領域的上述變化，大概已可以說明，在日本漢學超越自身傳統、追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西方的影響，究竟起到了多少作用。而

伴隨這一「西化」過程產生出來的另一趨勢，是在許多日本漢學家的心底也漸漸生出一種對抗的乃至於壓倒的意識，即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心理。

早在明治時代，做過東京大學校長的井上哲次郎就宣稱，歐洲的東洋研究特別是有關日本和中國的部分畢竟幼稚，因而研究東洋史不僅是日本人的責任，也是日本人可以迅速戰勝歐洲的一項事業。他讚揚古城貞吉的《中國文學史》，就是拿文學史學中的陳勝、吳廣，來比喻它有揭竿而起、填補學術空白之效的。與井上哲次郎的心情一樣，白鳥庫吉也曾激憤地把西洋學者在東洋學領域的執先鞭，說成是跟東洋人在政治上的被侵略被蹂躪完全同等的恥辱，大有戰而勝之的意志與決心。

而當師夷之長技即對西方漢學有所認識之後，日本漢學家果然得出一個普遍的看法，那就是西方人解讀漢文的能力畢竟有限，不大容易做到博讀多識、融會貫通，難免常常因臆斷而陷入謬誤，在這一點上，日本漢學界其實很有優勢，因為日本長期受中華文化的熏染，一般學者都有深厚的底蘊，足可與西方人一較短長。這就是為甚麼中國的問題，要由日本人來解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這也是為甚麼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在一些日本的漢學家身上看到一種特別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是結合了東西文化的特點、兼有傳統與現代之長的一群。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在基本文獻資料的掌握上勝過西方，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自己在研究



手段的更新上，領先中國一步。關於後者，吉川幸次郎曾經舉例說，中國文學的歷史及美學特徵，就是在西洋方法的啟發下才作出理論化的闡述的，在這一問題上，日本人的研究無疑先於中國人。

一九三七年底的吉川幸次郎，或許也就是因為如此，才在周作人的面前表現出了那麼樣的自信和坦率。

## 二

這裡選譯的，就是在近代這樣一個由東向西的大變動時期，仍然保有深厚的傳統漢學的修養，可是視野已擴大到東洋甚至世界上，同時又有過留學或遊歷中國的實際經驗的這樣一些日本漢學家的隨筆。

書名取自吉川幸次郎寫的一篇隨筆的題目，這個題目，曾經也用在吉川幸次郎的一本個人隨筆集上，在為那本同樣取名為《對中國的鄉愁》的小冊子所寫的《解說》中，對這樣一個題目，貝塚茂樹有一段註解式的說明，他說：「吉川幸次郎氏為這個隨筆集取名《對中國的鄉愁》，鄉愁一詞，在他的意識中，我想這時是與一般人理解的鄉愁完全不同的。它與學子對於偶然邂逅的巴黎、瑞士懷有的那種鄉愁，或

許有同樣的內涵。它指的是在法國留學的人回憶起巴黎的留學時代，在瑞士的旅行者回憶起攀登阿爾卑斯山時的情景，在那時表現出的一種感情。這個鄉愁，不過是借用來說明終歸為異邦之人的日本留學生、旅行者對待異鄉的情感，是超出了這個詞的本意的。」<sup>①</sup>強調「鄉愁」的「鄉」，已非「故鄉」之意，卻不過是人生中偶然停過的一站，這一點，也正是我們寄望於中文世界的讀者應當明瞭的。

以下簡單介紹入選者的經歷。

青木正兒（一八八七—一九六四），一九一一年畢業於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科，他的父親，據說就是一位頗有漢學修養和中國趣味的醫生。他的興趣最早是在元代戲曲上，也是最早把胡適、魯迅代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介紹給日本漢學界的人。早年主要研究中國的文學藝術，寫有《支那近世戲曲史》、《清代文學評論史》等，涉及詩文戲曲、繪畫音樂、宗教民俗等眾多領域，晚年則集中在名物學上，往往結合實物訓釋文獻所見事物的名稱，也涉及居住飲食、輿服工藝等諸多內容，著有《中華名物考》一書。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考察過中國，寫有遊記《江南春》。

石田幹之助（一八九一—一九七四），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的史學科。翌

① 見吉川幸次郎《中國への郷愁・解説》，東京，河出書房，一九五六年。

年到中國東北等地作學術調查，同時負責為岩崎久彌收購北京王府井的莫里森文庫也就是後來的東洋文庫，以後長期主持該文庫的工作。莫里森文庫以收藏有關中國的歐文書籍而聞名，這與他的學術興趣始終在東西交通史上相當吻合。前面提到他寫有《歐人的支那研究》一書，曾經多次印刷，影響很大，隨後發表的《歐美的支那研究》同獲好評如潮。他還有另外一部著作《長安之春》，描寫唐代長安這一國際性大都市的種種風情面貌，迄今都是公認的東洋學名著。他是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朋友，芥川龍之介的小說《杜子春》，據說便是根據他提供的素材寫成的。

宮崎市定（一九〇一—一九九五），一九二五年畢業於京都大學的史學科。他在大學時代，就對擁有古老文化的漢族與北方樸素遊牧民族的關係甚為留意，這或許就是他後來寫作《中國奢侈的變遷——羨不足論》一文與《東洋的素樸主義民族和文明主義社會》一書的最初思考。大學畢業前夕，他曾參加文部省的學生考察團來到南中國的上海、廣東等地，一九三二年又曾以軍人身份在上海附近駐紮過三個月。一九三六年前往巴黎留學兩年。他主要研究宋史、中國制度史和社會經濟史，涉獵廣泛，著述極為豐富，岩波書店為他出版的全集多達二十四卷。

倉石武四郎（一八九七—一九七五），一九二一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同年即到中國的上海、寧波等地旅行了一個月，隨後轉到京都大學讀研究生。一九

二八至一九三〇年在北京期間，與胡適、魯迅等眾多中國學者相往來，見於他用漢語寫作的《述學齋日記》。回國後，先後在京都大學、東京大學講授清朝的小學和音韻學，同時致力於中國語的普及教育，著有《中國語五十年》並參與編寫了《岩波日中辭典》。一九五四年、一九六〇年又隨學術考察團重訪中國的北京、上海、廣東等地。

吉川幸次郎（一九〇四—一九八〇），畢業於京都大學的中國語學文學專業。他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寒假，就第一次遊覽了中國的上海、蘇州、南京等地，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讀研究生時，又在北京留學三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都曾短期訪問中國。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文學和經學，但在專業性的研究與學院式的教學之外，也非常熱心地推動中國文學在日本社會大眾間的普及，這為他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譽。他的代表作有《元雜劇研究》、《新唐詩選》、《杜甫詩注》等，岩波書店為他出版的全集計有三十多卷。

湯川秀樹（一九〇七—一九八一）和小川環樹（一九一〇—一九九三）是一對親兄弟，一九三〇年代相繼畢業於京都大學，他們的父親小川琢治（一八七〇—一九四一）在中國歷史地理學上很有造詣，兄弟中，還有一個貝塚茂樹（一九〇四—一九八七），也是中國古代史的專家。小川環樹一九二八年曾與吉川幸次郎同往中國，一

九三四年四月到北京留學，次年轉至江南，在上海的內山書店，多次與魯迅會面。一九八一年四月為調查吳語再訪北京、南京、蘇州、上海。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學、語言學。湯川秀樹雖非漢學學者，他的專業是物理學，是一九四九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但由於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傳統漢學的教育，後來寫下過大量的談論東西文化的隨筆，頗能反映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和文化修養，這裡因此也收入他的與中國文化有關的三篇隨筆。

### 三

選編和翻譯這樣一個帶有學術性的隨筆集，是多年前就有的計劃。

我和賀聖遂先生本來的專業都是中國古典文學，跟日本並無關係，但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前後，學界好像曾經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認為日本的漢學尤其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典學的水準很高，而那恰好是我們先後進入到不同的大學，又在大致相同的理由之下，被勸說著學了日語的時候。此後的數十年裡，我們在各自不同的工作環境裡，因此也不斷接觸到日本漢學家的研究論著。

日本漢學家的論著，上個世紀以來，以中文翻譯或介紹的，已有不少。不過，

就我們日常瀏覽、閱讀的範圍來看，那也還是吉光片羽，尚不足以使中文世界的讀者一窺其全貌。特別由於向來譯介的，多為專業性較強的論著，這種不知有意抑或無意的選擇，有時更在讀者中間留下對日本漢學的片面印象。記得當初我們自己也曾接受過一種相當流行的看法，就是誤以為日本漢學家的所長，僅僅在編資料、搞考證這一方面，下的是死硬笨的功夫，做的是靜止沉悶狹窄的學問。直到後來閱歷漸增，才如「行山陰道上」，「山川之美，應接不暇」，發現日本漢學實在比想像中的豐富許多，包括那些精細碎瑣的考據和悉心編制的索引，原來都聯繫著時代的變遷、政治的演化以及與之相伴的學術的轉移。

我們相信，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歷史的和現實的背景，才使日本漢學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榮譽，並且綿延至今，仍然保持它的活力。我們也願意把自己歷年來的閱讀經驗貢獻出來，與讀者諸君分享，選譯這些學術性的隨筆，是我們的第一步。

關於選和譯，這裡要稍作說明。

首先，受限於我們自己的學力、閱歷，也為國內的日文書籍嚴重不足所限——這後一點，數十年前即為吉川幸次郎所察覺，他說，研究日本學的中國人最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日本書籍難求，又批評日本政府和有識之士對此漠不關心。研究日本如此，何況研究日本的漢學，而這種情況，數十年來竟一無改變——我們認真讀到過的日

本漢學著作，也許只可用汪洋中的一瓢來形容，因此這一次的選篇，雖然儘可能地避免了「揀到籃裡就是菜」，但也還是達不到理想中的真正「普選」。不過就在有限的條件下面，我們也設定了若干選的原則：一是為了體現近代以來日本漢學的上述重大變化，入選的作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二是儘量選擇論題不俗、篇幅適中、文字清暢的較有可讀性的札記隨筆，這既是為了照顧讀者的興趣，也是嘗試從另一角度反映日本漢學的活潑、有趣的一面。三是選文力求避開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以免去必要的卻也可能是複雜的背景解釋等等。

其次，我們選錄的這些學術性的隨筆，例如石田幹之助、吉川幸次郎、湯川秀樹等人的作品，即使在日語世界裡，也是為人稱道的，所以翻譯它們，毋寧說是對我們的專業知識和中文表達能力的考驗，為此我們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希望最後呈現在這裡的譯文，既能少失掉原作的精神，又能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在中文的世界裡，也可以獨自成篇。

戴燕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於藍旗營



# 青木正兒

◇ 夜裡香

◇ 茴香

◇ 用匙吃飯考

◇ 白樂天的早酒詩

◇ 中華文人的生活



## 夜裡香

那是在北京的一個夏日的傍晚。僮僕說：賣花的來了，咱不要。出得門來，近郊農民模樣的男人正把裝了月見草和連根的桔梗的擔子卸在門口。問那黃花的名字，說是「ye li xiang」，一到夜裡就開花，很香的，因此俗稱「夜裡香」<sup>①</sup>。紫花名曰「xiong guan mao」，好像官吏的帽子。「官帽」容易懂的，頭一個字卻不大明白。翌日去問識字的人，有人說「雄官帽」，於意不通。又有人說「升官帽」，當它還是花骨朵兒時，好像便帽（也就是民間一般的帽子），一旦花開，就變成官帽，這倒言之成理，我也就將信將疑了。這樣子，一直等到有機會向京大講師傅芸子請教，他聽了，並沒有立即回答，但後來再見面，就告訴我說，那大概是「僧官帽」，因為開花時的樣子，好像和尚帽。確實，這答案也許

① 夜裡香，或又稱晚香玉者。《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之《小奢摩館脞錄》有「晚香玉」條，說：「京師六七月間，有花一種，花小而白色，至晚乃香。香氣最烈，透人心骨。余與友人至東安門散步，常購花圈歸，置之房闥，香不可耐，隔宿輒棄去。或曰：中土向無此花，種子乃西洋產。清康熙間，始來中國，賜以今名。」讀書偶得，錄此以備參照。——譯者註

最為妥帖。

總之，當時我是把他賣剩的花草全都買了下來，種在窗前。月見草果然每天夜裡開出淡黃色的花，伴著幽夢般的難以名狀的芳香，撫慰著我的離鄉之情。可以說一地有一地的風土，做夢我也想不到月見草會有如此的香氣。從前只在鴨川岸邊見過野生的月見草，那個夏天，卻是在將夜裡香當成觀賞植物精心栽培的愉悅中度過的。後來到了仙台，有一年的初夏，妻子從同事家拿回來兩三種花苗，其中有一種叫做「待宵草」的，待它慢慢長大，鼓出花苞，不錯，是夜裡香。我高興地向妻子講起這花的香味，我們一起期待著，然而花開以後，卻一點也不香，掃興得很。但是它在夜色中綻放的模樣，依然讓人動心，所以搬家到京都時，就連它的種子也帶了去，種在小院裡，年年歲歲喚醒對於北京夏夜的回憶。

從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圖鑒》中知道，我現在種的是「おほまつよひぐさ」，一種原產北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世稱月見草，但白色的，又是另外一種」。鴨川岸邊和其他地方的「まつよひぐさ」，則是「原產南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種在庭院以供觀賞的，現在各地也都可以見到野生的」。這就是說，原先我以為月見草的，其實是待宵草，向人討來的待宵草的苗，反倒是世人說的月見草。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植物學大辭典》，同牧野一樣，也將「おほまつよひぐさ」稱做月見草，將「まつよひぐさ」稱做待宵草，它又好像是對日本書的翻譯，並沒給出中國方面的資料。這樣一來，我在北京見到的夜裡香，

應當就是原產北美的「おほまつよびぐさ」。它由北美直接進口還是假道日本而來？在原產地的北美有沒有香味？儘管我想搞清楚它們，但似乎缺少方便的途徑，好奇心也還不夠強。而我更想知道的是這花在中國是那樣的香，到了日本，為甚麼香氣全無？自然這是水土的緣故，本來不足為奇，但人有而我無，終歸叫人遺憾。<sup>①</sup>

我曾往廬山旅行，有一天，隨意獨行中忽然聞到花香，穿過森林，循著奇香而去，卻只見一株叢生的普普通通的棣棠花。我有點懷疑自己的鼻子，環視四周，除它而外，再沒有別的花，一定是它那兒發出的花香無疑。這花的形狀並不特別，可香味確實難得。《秘傳花鏡》說，棣棠三月開花，花呈金黃色，狀若小球，一葉一蕊，但繁茂而無香。可見在中國，一般也是不香的，不可思議的是，廬山的棣棠卻香氣逼人，堪稱罕有。自古以來，便有廬山與香花有緣的傳說，據說瑞香，也即日本人稱沉丁花的，就是廬山所產。宋人陶穀的《清異錄》卷二記載：廬山一位僧人，晝寢磐石之上，夢中聞到花香刺鼻，醒後找到那花，為它取名「睡香」。四方之人嘖嘖稱奇，以為這是花中祥瑞，於是改「睡」為「瑞」，

① 原作者「補遺」：對植物學聊有心得的長子亮說，「まつよびぐさ」的正式名字是 *Oenothera odorata* Jacq.，*odorata* 就是「香」的意思，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夜裡香就又不是「おほまつよびぐさ」，而應當是「まつよびぐさ」。

叫它「瑞香」。我在廬山漫遊之際，發現了這株帶香的棣棠，因而也可名之以飄香。

宋代奇人彭淵材平生五恨：一是鮒魚多骨，二是金橘太酸，三是蔬菜性涼，四是海棠無香，五是曾子固不能詩。李丹到昌州（今四川大足縣）做官。聽說來自遠方，淵材前去拜訪，並且稱讚其住處很好。李丹問他緣故，淵材回答：「天下海棠無香，獨昌州有香，非佳縣何？」這事見於《冷齋夜話》卷九。我們日本的歌人是不恨棣棠無香，但恨其不結果實，這不就矮了一等？大概因為水土的關係，昌州的海棠有香，廬山的棣棠有香，根據王漁洋的《居易錄》卷八，位於江蘇海州（今東海縣）東部的峽島上，更有深紅色、茶碗大的八重海棠，花香異常。

我在北京侍弄的待宵草，從姿態顏色上看，不過凡花一種，然而它的香味，卻讓我格外珍惜。不只是愛這一種花香，我對所有花的評判，都是香在色之上的，就是食物，也欣賞其香甚於欣賞其味。對文學、美術的看法也都如此，與其說重視技巧，不如說更看重它們的風韻，也就是味道。這是我的一個習慣，並沒有高深的理由或理論。

從小我的鼻子就很靈，喜歡香的東西。把媽媽和姐姐用過的空香水瓶放進抽屜，每開一次抽屜，都會聞到香味，有時偷偷拿起瓶塞聞一聞，也是一種享受。好比說點心吧，我喜歡的也是水果糖，既喜歡它富於變化的色彩，更喜歡隨不同色彩而散發出來的種種香味。那時還沒有日本國產的，英國一家叫莫爾頓的公司生產的瓶裝水果糖在鄉下也少見，我們

很少能吃到，因此非常珍貴。肥皂如果不是進口的，也不香，所以上了鄉下的中學之後，一回家就纏著母親，要把肥皂帶去學校。

我的嗅覺大概是受了父親的遺傳。父親對樹沒甚麼興趣，卻喜歡香花，盆栽的建蘭、沉丁花、茉莉花、薔薇，擺滿一院子，蘭花與茉莉花開時，總要被搬到壁龕上。我模仿他，也把梔子花插進香水瓶，放在桌上。父親嗜好香料，夏天要喝柚子酒，初春要嚐蜂斗菜的醬湯，這對我後來也有影響。我不僅繼承了父親的嗅覺，接受了他的庭訓，鼻子的要求也逐年增高。

不過近年來，我的鼻子變化很大，從仙台移居京都以前，因為忍受不住東北的寒冷，持續有半年多的鼻炎，導致了嗅覺失靈。記得明人馮時可的《上池雜識》中有一個奇怪的說法：俗話說不能去聞花香，聞了容易得肺結核。而依照我的經驗，花開時，裡邊會有無數小黑蟲，香氣就來自這些黑蟲。如此說來，我的鼻子或也是因了這些黑蟲作祟。可以聞的東西，已經聞過許多，倒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然而飲酒、喝茶、吸煙、吃飯，竟也不如從前有味道。過去我對酒是很在意的，現在卻連一級、二級都分不出來，就連三級酒的味道，舌頭也嚐不出來，這才明白，從前的判斷靠的是鼻子，香味如何，決定於鼻子的狀況。懷念過去的幸福時光，就好比回到久別的家鄉：醬湯的香味多麼讓人歡喜，聞聞女兒的化妝品，還有近期配給的肥皂，腌黃瓜不就是這種味兒嗎？香木和香水的氣味，都可以不知道，但